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 学术体系建构*

戚聿东 朱正浩 赵志栋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学术影响力仍显不足,理论发展现状与人工智能时代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为了系统性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主要制约因素,继而从知识创造的视角,剖析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管理学知识创造的过程,以及人工智能驱动下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策略和未来研究机会。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化—表出化—组合化—内部化”螺旋式上升的知识转化过程,中国管理学理论得以发展和完善。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经历了一个相互依赖、循环递进的建构过程,包括跨领域个体经验分享和人机协同、学术共同体间的交流与理论整合、学术生态的丰富与优化,以及学术生态与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本文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方向性启示。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 知识创造 中国管理学 学术体系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之一,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内核和支撑,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所在。从广义看,学术体系包括三方面内容:作为知识的“学术”、为“学术”服务的组织及惯例,以及从属于“学术”的活动和文化。作为知识的学术体系是核心部分,指在学科框架内形成的,揭示事物本质及一般规律的系统化的理论学说体系,体现了“学”和“术”的辩证统一,是理论抽象与实践应用的高度统一(王方华,2022)。为“学术”服务的组织和惯例,包括大学、研究所、学会等学术机构(王嵩迪,2024),以及同行评审、研究伦理等长久形成的学术惯例(刘爱生,2013)。这些组织与惯例确保了知识生产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并推动了学术创新。学术活动与文化包括学术交流、学术写作与出版等活动,以及学术传统、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文化因素(王一军,2022)。据此,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是立足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研究和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建构和发展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知识体系,以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管理学学术组织、惯例、活动和文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③,也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创新成果集中爆发的技术奇点期,以及AI经济奇点的蓄势待发期,这对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管理学的核心属性是实践性,“实践出真知”不仅意味着管理知识源于实践,还表明实践是检验理论有效性的主要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管理

收稿时间:2024-3-17;反馈外审意见时间:2024-7-22、2024-9-9;拟录用时间:2025-3-4。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金号:19ZDA077)、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基金号:2022SKYJ01)的资助。朱正浩为本文通讯作者。

学理论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明确的方向指引。与此同时, AI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潜力的通用技术, 正深刻改变管理实践与研究范式(巴拉迪亚, 2023; 林等, 2023; 刘景江等, 202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 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面临双重任务, 一方面, 需要紧跟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 在实践中重新审视传统理论框架, 推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旋转门”(白长虹, 2018), 逐步形成具有稳定架构和自洽逻辑的学术体系, 更好地适应并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实践; 另一方面, 必须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探索其对中国管理理论的深层次影响, 例如, 如何深入挖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城乡融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四新一高”^④等方面的独特实践, 提炼出基于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思想, 提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对策。

然而, 从发展现状看, 中国管理学的学术影响力仍然较为薄弱(洪永淼、汪寿阳, 2020), 中国管理学理论尚处于借用西方管理理论“照着讲”的阶段(盛昭瀚、于景元, 2021), 管理学理论发展尚不能充分解释和引导中国管理实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⑤。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脱节(白长虹, 2020)。在学术研究中, 过度依赖“数学化”和“模型化”的倾向(李志军、尚增健, 2020)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脱节,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西方管理理论中的定量模型和数学工具, 力图以此解构复杂的中国管理现象。然而, 这些抽象化和高度模型化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管理实践的特殊性, 使得中国管理问题难以匹配西方理论框架内研究的标准答案(魏江等, 2022), 导致了本土理论发展滞后。此外, 尽管机器学习与计量经济学的融合为管理研究提供了新契机, 但目前中国管理学界尚未充分利用这些新方法来有效应对中国特有的管理实践问题(刘景江等, 2023)。

管理理论发展现状与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错位”引发了一个核心理论问题: 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 已有研究指出, 在西方管理理论主导的话语体系下, 学者对“中国情境”的研究中普遍存在学术构念和测量方法的偏差(魏江等, 2022), 构建符合中国情境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学者们普遍认同, 中国管理学的理论构建必须扎根于中国的管理实践, 如盛昭瀚(2024)认为建构我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扎根中国管理实践同源同根。尽管已有共识,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 目前并无现成答案。为了系统性解答这一问题, 本文遵循“制约因素—建构过程与机理—建构路径—研究展望”的基本思路, 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制约因素, 并从知识创造的视角出发, 剖析了 AI 技术赋能管理学知识创造的过程和机理。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建构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目标、特征、原则和路径。最后, 本文展望了未来中国管理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研究机会。

本文有 3 个主要贡献。第一, 系统性研究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制约因素和建构机理, 本文为构建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提供了发展策略和路径指引。第二, 审视了 AI 技术赋能管理学知识创造的过程。借助知识创造的社会化、表出化、组合化和内部化 4 个环节, 分析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管理学知识的生成和转化, 揭示了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机理。这为理解人工智能在管理学理论构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 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策略, 并认为未来研究机会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领域, 涵盖了理论建构和方法变革。本文强调, 中国学者应立足中国情境, 把握中国现象, 融入中国元素, 聚焦中国问题, 展开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建构具有高度原创性和强解释力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 进而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为全球管理学贡献中国智慧。

二、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制约因素

管理学理论源于实践, 通过对管理现象的发现、管理概念的提炼, 推动理论进步。同时还通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旋转门”实现理论验证和应用, 最终用于指导实践(如图 1 所示)。在人工智能时代, 中国管理实

实践的深刻变革成为管理学理论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管理学理论形成的难度,构成了理解学术体系建构制约的第一个视角。实践属性还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必须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中国情境是中国社会在整体转型过程中不断动态演化的概念,由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复杂子系统相互交织形成,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管理理论构建的复杂程度,成为理解学术体系建构制约的第二个视角。学科体系则为管理学理论发展提供了结构化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培养框架,通过学科划分标准、知识领域边界和各知识模块的层次关系,学科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研究定位和方向指引,当前中国学科体系发展的时代适应性不足,主要表现在学科专业分类未能充分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成为理解学术体系建构制约的第三个视角。同时,中国管理学在理解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方面能力不足,制约了对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实践的理解,这是理解学术体系建构制约的第四个视角。最后,作为学术体系的内容之一和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管理学的学术生态环境仍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了中国管理学的创新能力,成为考察学术体系建构制约的第五个视角。总之,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要回答新时代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⑥,必须深入理解 AI 技术革命、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管理学科专业分类、管理理论发展现状以及学术生态环境等多重制约因素。

(一)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实践变革增加了中国管理理论形成难度

人类已步入数字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信息的挖掘、分析和管理,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实现机器的自主决策和自我学习,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迈进(王秉,2023)。人工智能的经济奇点正在加速到来,研究显示,如果深度学习在研发中普及,将促进经济增长率增加 1.7 到 2 倍(贝西奥卢等,2024),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明显加速,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之一(刘涛雄等,2023)。AI 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力量,正广泛影响各个行业,对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了深远的变革。这些变革覆盖了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生产作业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金融等几乎所有领域,数据驱动决策、数字金融、智能化运营、个性化营销、智能仓储管理、开放式创新与合作等新概念不断涌现,与之相关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例如,企业如何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优化运营、预测市场趋势、实施动态定价以及提供决策支持(巴拉迪亚,2023)? AI 支撑的组织决策如何在确保效率的同时,符合社会和道德标准(海因莱因等,2022)? 金融科技如何通过 AI 技术开发商业模式、管理内部资源,并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拉格纳·拉维尚卡尔,2022)?

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实践变革增加了中国管理学理论形成的难度。当前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与西方企业不同的挑战,这使得中国学者很难通过“拿来主义”的方式,以西方管理理论“照着讲中国故事”。首先,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独具特色,要求企业在智能化管理实践中充分考虑本土市场的特殊需求与行为模式。例如,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下,中国电商平台在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推荐中应用 AI 技术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面临处理海量数据与分析复杂用户行为的巨大挑战。其次,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小院高墙”^⑦战略折射出中国企业在智能化转型中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的迫切性。“加强关键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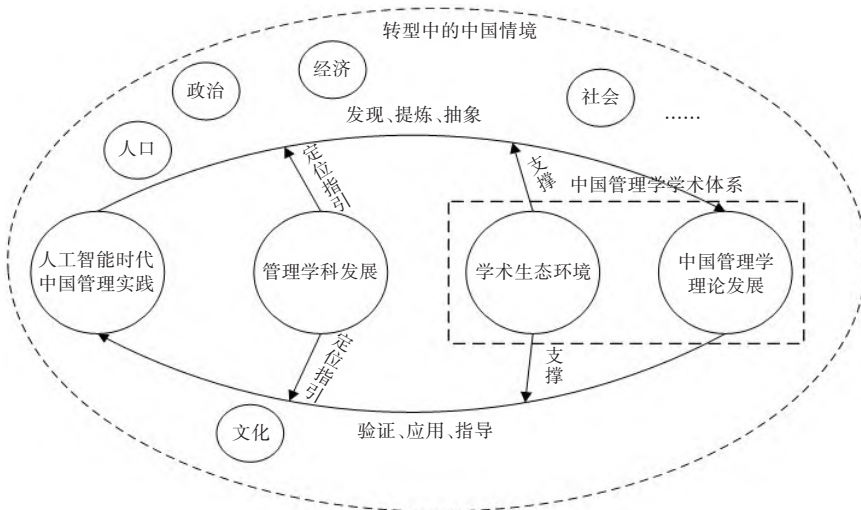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构建的主要影响因素

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⑧已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复杂性和紧迫性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前所未见。最后,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市场主导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完善市场机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独特政策环境下,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并不能准确解释中国的管理实践。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中国管理学者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管理学视角深入探讨中国情境下的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以有效回答时代之问。

(二)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加剧了人工智能时代管理理论形成的复杂程度

情境是中国管理理论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崔,2006)。一方面,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情境因素下,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有限,例如,西方理论中关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假设难以套用到中国情境中,如汪立鑫和游怡乐(2024)指出,中国地方政商关系在关系主导、发展目的和合法性边界上,与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中国情境在整体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演变,使得准确理解并抽象出“中国元素”变得困难。例如,“关系”是中国企业管理中理解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的关键元素,智能化出现对“关系”的价值产生了影响(刘等,2024),由于AI技术难以全面捕捉和表达“关系”背后的社会和情感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企业的“关系”理论。总之,嵌入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理论发展面临着“西方理论难适用”与“本土理论难开发”的难题。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交织的多情境因素放大了上述困难。从技术、文化和经济交织的视角看,AI技术的快速迭代常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冲突。例如,中国企业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和“关系”网络(陈德球等,2021),在引入AI客户服务系统时,企业必须确保不会因此削弱对客户尊重和关怀。因此,中国管理理论需要在技术进步和文化遗产间建立起良性张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⑨,并将之具象化和抽象化为中国元素和中国理论。从社会、制度和技术交织的视角看,人工智能对职业产生了“智能替代”和“智能创造”效用(王林辉等,2023),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小家庭结构以及“佛系青年”^⑩等现象,与国家人口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变革,共同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研究者需要从这些复杂情境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管理理论和应对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情境因素跨阶段错位叠加进一步放大了上述难题。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企业在未完成信息化的背景下,已面临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压力,迫使企业在错位的技术演变过程中尽快实现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制度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多种情境要素往往同时发生,但两者的推进速度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使得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多重管理挑战。例如,绿色发展政策要求制造企业投资于环保设备以减少碳排放,而智能化转型则要求企业同时引入AI技术进行生产和管理。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两者改造时间和资源分配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和战略变革冲突。情境因素跨阶段错位叠加条件下,企业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竞争力,这就需要研究者建构动态适应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例如,如何在复杂情境下推动制造业企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多情境因素交织对研究者提出了多学科整合能力的要求,研究者需要结合技术、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系统性建构理论,这种整合提炼的过程无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挑战性。

(三)我国管理学学科专业分类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

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实践重塑了管理学科本体,推动了多个管理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涌现,促使管理学科体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例如,算法和大数据融合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用户价值导向的商业逻辑逐渐取代了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逻辑(戚聿东、肖旭,2020)。与此同时,AI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新的管理生态。通过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提升数据的可得性和优化技术工具的用户体验,AI技术不仅使普通民众、中小企业和基层员工能够共享智能化发展成果,也进一步推动了管理实践创新。这一变化不仅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契合了“共同富裕”的制度理想,构建出更为包容、多元、有效的管理生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机器学习的计量学、人工智能决策、人机协同管理、数据伦理和治理等正成为前沿学科。以机器学

习与计量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为例,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已显著影响了管理学研究中的变量测量、事件预测、因果推断与理论建构(刘景江等,2023)。美国主流院校如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已经开设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交叉学科项目。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开设了统计学与机器学习联合博士项目,强调了机器学习和计算机科学在统计学中的应用。这类项目的设置是为了满足人工智能对跨学科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需求。

学科专业分类为中国管理学学术知识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22年9月颁布了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新版目录”),共设置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等5个学科类别,设置了会计、审计、工商管理学等7个专业类别。新版目录优化了管理学科专业结构,有利于促进研究生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衔接。尽管新版目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管理学科与时俱进,仍存在一些局限,难以完全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实践的变革需求。首先,交叉学科领域的覆盖面和包容性尚不充分。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深度交叉愈发明显,如人工智能与管理科学的融合催生了“智能管理”“AI决策”“机器学习与统计学”等新兴学科领域,但在新版目录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其次,新版目录突出强调现有学科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基本沿袭了2018年修订版的学科分类。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创新动力,无法及时捕捉新兴管理实践需求,限制了管理学科对新技术新现象的灵活响应,未能完全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学科交叉和管理实践的迫切需求。

(四)中国管理学理论发展现状难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实践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逐步引入并借鉴了西方管理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发展路径:一是通过应用西方管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管理实践的“照着讲”;二是通过利用中国管理实践来检验、修正和发展西方理论的“接着讲”(盛昭瀚,2024)。这两种路径推动了学术进步,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管理实践的独特性和本土化需求。管理学是一门高度实践导向的学科,理论化某一管理现象必须回到构成该现象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中,进行深入研究和归纳(费尔德曼、奥利科夫斯基,2011),而非简单地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预设前提进行机械性演绎。尽管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但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研究中国问题时,常常出现学术构念和测量方法的偏差(魏江等,2022)。虽然部分学者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本土理论,如李平的“阴阳管理理论”、席西民的“和谐管理理论”、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贾利军的“五行正义”营销理论等^①,但是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管理研究仅仅算是“亮相”,初步获得国际主流学界的合法性和注意力(魏江、陈光沛,2022),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独立学术体系。

中国管理学理论在反映中国情境、凝练中国元素方面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系统性总结尚不充分,缺乏对管理现象深层次的理论归纳和整合,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系化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很多研究仍将中国管理实践作为验证西方理论的背景,研究主题多集中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与验证,忽视了对中国独特本土命题和真实管理问题的深度提炼。这导致现有研究在具象化和结构化中国情境与中国元素方面能力不足,难以突破“西方判断标准”的束缚,原创性理论凤毛麟角。原创性研究的产生不仅要求对中国管理实践有深刻的洞察,还需要具备独特的理论视角,这是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短板。正因为如此,现有理论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实践中的新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智能化重塑了企业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对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智能生产、组织管理、战略、人力资源、营销等领域提出了新挑战。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两类管理现象和问题,一类是中国情境下的特殊现象,如新质生产力、新型举国体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大规模市场、种草短视频^②、网红现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卡脖子”技术等,都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元素。这类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还揭示了智能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独特发展路径。另一类是普适性管理问题,如AI的技术风险与安全问题、人机协同、智能制造、智能化转型、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企业韧性、职业变迁、创新生态与网络、价值共创、智能决策等。

现有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情境下的普适性管理问题。例如,关于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企业韧性的研究,西方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奥尔蒂斯-德-曼多哈纳、班萨尔,2016),有助于研究者探索中国情境下企业韧性的决定因素与实现机制等。然而,当面对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管理现象时,现有理论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新型举国体制”(路风、何鹏宇,2021)是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独特作用。在这一体制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资源整合以及政策支持构成了独特的管理模式。然而,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缺乏相应的解释框架,难以有效分析和理解这一复杂现象。正如封凯栋和陈俊廷(2023)指出的:“新型举国体制目前仍然是一个政策概念,而非理论概念。关于科技政策、国家创新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现有研究,尚未对此展开系统性的理论讨论。”这些例子表明,虽然西方理论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普适性管理现象时有其价值,但在解释中国特有管理现象时,其适用性有限。因此,加快构建符合中国情境、解释中国现象的管理学理论,已经为当务之急。

(五)学术生态环境制约了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发展

刘曙光(2023)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一文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面临诸多问题,包括研究成果有数量缺质量;科研人员急功近利,难以潜心学问;学术氛围差,学术交流缺乏深度和广度;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各种评价体系过度量化,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忽视中西差异,盲目追求西方标准等。这些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学科领域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首先,科研评价体系的过度量化和短视化倾向,使得学术界急功近利的现象愈加严重。许多管理学者关注追求快速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而忽视了长期深入的学术积累。在人工智能时代,学者们倾向于选择容易产生成果的普适性管理问题,如职业变迁、智能制造等。这些问题因其具备相对成熟的西方理论框架,更容易发表在国际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因此成为学者们的首选。相对而言,诸如“新型举国体制”“种草短视频”等具有丰富中国元素的管理现象研究相对稀缺。原因在于,这类问题通常需要长期的实地调研、复杂的数据收集以及基础性理论的构建,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可发表的成果。学术风气的急功近利导致研究成果高度同质化,许多学者以中国情境和数据验证或扩展西方理论,缺乏原创性和本土应用价值。这种现象导致中国管理学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企业的实际管理问题时,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和解释力。

其次,学术共同体的缺位严重制约了人工智能时代本土管理理论的发展。学术共同体是由具有共同学术志趣、学术目标和专业技能的群体构成,旨在推动学术交流、知识共享以及促进合作与创新。然而,目前中国管理学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学术交流多局限于学科内部,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度合作,这与人工智能时代对管理理论跨学科发展的需求不符。此外,政产学研合作缺乏深度,研究者与企业管理人员及政府官员的互动与合作多停留在形式上。许多学者忽视了对中国管理现象的挖掘,研究问题多源于西方文献,研究成果也多回归西方文献,导致中国情境被仅仅作为验证“主流管理理论外部效度的检验环境”(菲拉托切夫等,2022)。这种现象限制了对中国本土管理问题的深度理解,使得研究停留在抽象认识和粗糙描述的层面,甚至有学者为迎合西方理论框架而“削足适履”,对中国现实进行不适当的改造(魏江、陈光沛,2022a)。学术管理体制的僵化进一步阻碍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例如,多数院校和学术机构过度强调第一作者的重要性,导致研究者更加关注个人学术成果,缺乏参与或建设学术共同体的动力。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导致创新氛围不够浓厚,从而限制了知识的创造和共享。同时,学术共同体内部资源共享机制的不完善,阻碍了更多学者对本土管理理论的创新性参与。最后,科研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倾向使得学者们在研究资助、研究效率和研究灵活性方面受到限制。现有科研管理体制更倾向于支持那些风险较低、预期成果明确的项目,而具有高原创新性、高风险且周期较长的管理研究项目往往难以获得资助。这类项目通常需要长时间地深入研究,难以在短期内产出显著成果。严格的行政化管理体制还迫使学者们花费大量时间应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如项目申请、经费报销等,耗费了宝贵的研究时间,降低了研究效率。此外,现行制度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难以有效应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需求和新挑战,进一步限制了管理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三、AI 赋能与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知识创造过程与建构机理

面对诸多制约因素,为了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建构发展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我们应从更高视角进行审视。纵观管理学说史,管理理论始终是在“立足实践、超越实践、反躬实践”的闭环中不断创新的。无论哪一个阶段的重大理论学说,大多是具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管理学家总结提出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古典组织理论及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都是公司总经理级别的企业家。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流派代表性人物中,穆尼、戴维斯、孔茨、巴纳德、德鲁克等,都是直接经营企业的企业家。在当代管理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诸多学派的奠基性成果,也多是出自具有深厚实践背景的管理学家或企业家,如彼得斯、波特等。甚至诸多代表性成果直接出自企业,如通用电气公司提出的GE矩阵、摩托罗拉公司提出的六西格玛理论、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方式、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理论等。管理理论源于实践,通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旋转门”实现应用与反馈,推动学术体系的不断完善。将复杂的管理实践提炼为科学的管理理论,需要经过系统的分析、筛选与提炼,这正是管理学者的使命所在。为深入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引入SECI知识生产理论,该理论揭示了隐性知识(源于实践的经验)与显性知识(抽象为理论的概念)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指出了知识创造的规律:实践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知识应用、验证和推动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1995)。

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加速向“智能化科研”(AI for Science)方向转变(李国杰,2024)。人工智能科学家特斯勒(Larry Tesler)提出了“特斯勒定理”,意即AI每当取得突破时,都会被重新定义,这意味着AI被定义为“一切尚未完成的事物”。与之相呼应地,2007年图灵奖得主盖瑞(Jim Gary)提出了科学发现4种范式的演变,即实验观察、理论推导、模拟仿真、数据驱动;当下和未来,“智能化科研”的蓬勃发展,正在颠覆科学研究的既有模式,有望成为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自2012年以来,得益于大规模数据集的可用、快速并行计算和存储硬件发展,以及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算法的支撑,AI正越来越多地融入科学发现,通过生成假设、设计实验、收集和解读大量数据集等方式,极大增强和加速研究,并获得传统科学方法单独使用时可能无法获得的洞察(王等,2023a),新科学范式将管理知识创造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推向了新水平,能够帮助管理学者更高效地发现新理论并优化现有的管理实践,同时,新科学范式并未颠覆知识创造的基本规律。管理理论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化阶段的实践经验,还在表出化与组合化阶段对实践进行超越,并最终通过内化作用反哺实践。通过这一动态循环,管理学理论不断得到验证、创新和发展。

(一)AI赋能中国管理学理论创造的过程

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核心是成体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形成,解析这一过程可借鉴SECI知识生产理论。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知识管理和创新领域,尤其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背景下,SECI模型被用于探索学术知识共享活动以及数字化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费斯、西姆,2018)。基于SECI模型,管理学知识创造包括4个阶段,如图2所示,个体隐性知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群体隐性知识的显性表出化(Externalization)、群体显性知识组合化(Combination)以及群体显性知识的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在社会化阶段,个体之间共享和传承的是共感知识,这些知识体现在管理实践中的经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中,广泛影响组织文化、团队合作、领导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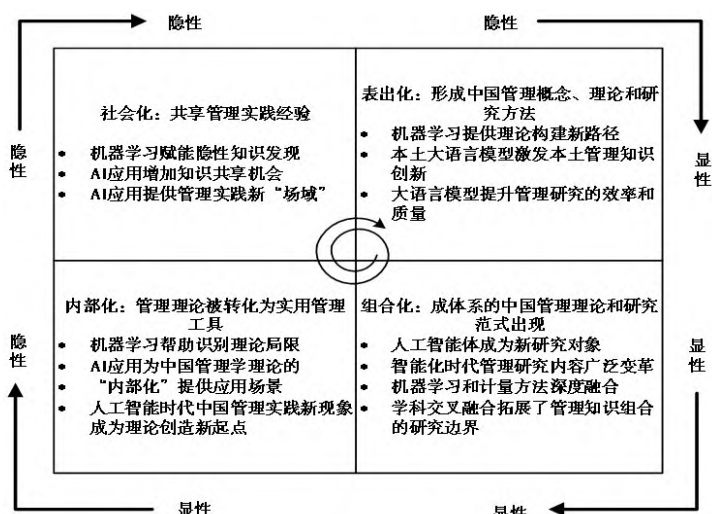


图2 AI赋能中国管理学理论创造的过程

客户服务和创新等管理活动。在表出化阶段,隐性知识被转化为显性知识,形成明确的管理概念、理论或方法。例如,人工智能体[®]的“理性”活动现象是通过“机器经济人”(帕克斯、韦尔曼,2015)类比而形成的概念建构。组合化阶段是将这些显性知识进一步整合,形成被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的系统化理论和研究范式。例如,为了解释如何利用AI建立竞争优势,肯普(2024)提出了一个情境智能化理论框架,系统地解释了企业智能化定位所涉及的组织基础、边界和驱动力条件等关键要素。在内部化过程中,系统化理论被转化为可应用的管理工具和技术,用以提升企业管理效能。例如,零售企业利用大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销售数据和库存水平,进而优化库存管理和供应链策略,不仅提高了销售效率,还降低了库存成本。通过这种知识创造与转化的动态循环,管理实践与理论得以相互促进,不断推动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完善与发展。AI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管理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

AI赋能中国管理学理论创造始于“社会化”过程,主要在三方面产生了影响。第一,机器学习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识别隐藏的模式和关系,发现传统方法难以察觉的结构、规律和趋势,这种学习不仅限于显性知识,也包括从员工行为、市场趋势和竞争对手分析中发现隐性知识,例如,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组织可以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和关键技术(查萨尔、施泰因贝格,2022)。同时必须指出的是,AI算法对隐性知识的有效识别和解释,取决于高质量的数据集,以及AI在组织特定情境中的根植(grounding)程度(肯普,2024),此外,隐性知识的情境性、情感性和复杂性,仍然是当前AI面临的巨大挑战。也因此,AI虽然可以赋能人类更高效地获取隐性知识,但是难以完全替代人类的知识社会化过程。第二,AI技术应用极大提升了政产学研合作的便捷性和灵活性,降低了交流成本,增加了知识共享机会。例如,语音识别、实时翻译等工具的普及,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障碍显著减少,推动了中国管理实践经验的分享和传播。第三,AI技术的介入重新定义了商业价值创造过程,促使企业向用户中心方向发展。这一转变推动了企业在多个层面的创新实践,如组织结构网络化、营销策略精准化、生产过程柔性化以及研发活动开源化等(威聿东、肖旭,2020),为管理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新型举国体制、种草短视频等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这些现象为中国管理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展开视角,成为原创性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

在表出化阶段,隐性知识通过比喻、类比、概念、假设和模型等方式被转化为显性知识,AI技术提升了隐性知识的形式化能力。第一,与传统理论构建更多依赖于演绎推理和直觉不同,机器学习提供了一种从数据中自动识别模式并构建理论的新途径。通过算法支持的归纳推理,研究者能够在大规模数据中发现有意义的模式,并将这些模式转化为理论假设(施雷斯塔等,2021),从而极大拓宽管理研究视野。第二,相比于国外大语言模型,本土模型在语言文化背景设置、本土数据资源接入、政策和制度理解、学术和行业需求的适配以及实时反馈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毕达天等,2024)。这些优势帮助激发了本土管理知识创新,提升了研究者在中国管理理论方面的表出能力。第三,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综合使用,能够提高管理研究的效率和质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能帮助学者更快速地进行文献回顾、生成研究问题、设计研究工具、分析数据,提升论文论证的清晰度(格莱姆斯等,2023)。

在组合化阶段,需将“表出”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系统化。“智能化科研”范式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等方面带来了实质性转变,深刻影响了组合化过程。研究对象上,人工智能体日益成为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AI不只是单纯的工具,而是能够自主决策、学习和适应的系统,加速了管理知识在人工智能体介入下的重组过程。例如,唐曼等(2022)实证研究指出,在与智能机器互动中,尽责性员工(conscientious employees)可能不再像与传统技术互动时那样表现出色,这是由于此类互动可能导致“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程度增加,尤其当智能机器决定工作流程时,员工对其工作职责和期望感到困惑,导致员工未必能从与智能机器的合作中获得预期收益,从而挑战了关于尽责性和技术的传统共识。在另一项AI介入的管理研究中,吴小龙等(2023)通过对一家智能创意广告企业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基于人与AI协同的产品创新价值验证方式。研究内容上,鉴于AI对管理实践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系统性研究正在不断展开,涵盖了从AI价值驱动(李卫兵、张星,2023)、AI价值创造(吕越等,2023)到AI创新生态和AI伦理等领域。几乎所有管理学领域都受

到了AI的影响,包括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生产作业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和金融等。研究方法上,机器学习技术与计量经济学的深度融合成为管理学研究新趋势(阿西、因本斯,2019)。新型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和高频数据的涌现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变革,为管理知识组合化创造了条件。刘景江等(2023)指出,机器学习在变量测量、事件预测、因果推断和理论构建方面对管理学产生了系统性影响,例如,乔杜里等(2019)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技术分析首席执行官访谈中的面部表情,开发了不同沟通风格的测量工具。在对某一现象存在许多竞争性先验知识的情况下,机器学习的预测选择(Predictive Selection)策略,对于识别最具预测性的变量,从来推动碎片化知识整合具有强大的潜力(冯·克罗赫等,2023)。研究范畴上,学科交叉融合是“智能化科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李国杰,2024),拓展了管理知识新组合的研究边界,管理学与信息技术、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交叉已经十分常见。

在内部化阶段,第一,机器学习能够帮助学者识别现有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从而有助于避免“生搬硬套”式的管理知识应用。贝利科夫等(2022)利用贝叶斯计算来预测基于从先前文献中提取的数据,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基因调控相互作用研究,识别出一组预测跨上下文可重复性的基本特征,并用于指导学者在研究主题和项目选择中的决策。与生命科学领域相比,管理学科在概念、理论、方法和数据上具有更多样性,机器学习为管理学者理论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指出,机器学习的简化发现(Reductive Discovery)策略,可以揭示数据集特征之间尚未发现的关联,从而质疑现有理论解释的适用性(冯·克罗赫等,2023)。第二,AI应用为中国管理学理论“内部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通过对不同情境的深入理解,现有管理理论逐步被转化为实用的管理工具和方法,帮助企业提升运营效率、优化管理效果,推动智能化升级。例如,何江等(2021)提出的四叶草组织理论,为理解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广泛采用灵活用工和智能机器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该理论描述了一种由专业核心劳动力、灵活用工劳动力、智能机器劳动力以及产消者劳动力组成的新型混合劳动力组织形态,强调以人为本、多元共生、灵敏柔性、虚拟数智、扁平无界和生态连接六大特征。这一理论的“内部化”在智能化发展的中国情境下展开,包括如何在“专精特新”企业中适应人机协作的组织结构变革、如何通过建设混合劳动力组织提升企业韧性,以及如何有效建设混合劳动力组织等关键管理实践问题。第三,现有理论与智能化时代中国管理情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体的“机器能动性”和“拟主体性”(王俊秀,2023)促使研究者思考其在中国管理环境中的独特运作方式,例如,智能化带来的混合劳动力环境对员工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的挑战,以及智能机器人与国有企业员工之间的互动关系、新生代员工在智能环境中的幸福感等问题。这些现象在揭示现有管理理论局限性的同时,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二)AI驱动的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机理

智能化实践已成为中国管理学科理论创新的来源和关键驱动力,通过赋能知识创造的各个阶段,促进管理理论发展。AI快速迭代改变了管理实践的行为主体和基本逻辑,还重塑了商业价值创造的方式和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动”捕获这些新现象,将其具象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进而抽象为一般性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基于SECI模型的各个环节,深入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机理。

在社会化阶段,知识创造主要依靠学术个体跨领域经验共享,将管理实践知识提炼为管理经验知识和独特的中国管理现象。第一,AI技术应用提供了新的管理实践场域。研究者需要与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等不同领域的人士共享AI管理经验知识(见图3)。实践经验是管理实践经由感观进入个体意识的最初材料(张正堂,2023),其特点是高度情境依赖,尚未被提炼为具有一般意义的中国管理现象。例如,企业为了提升供应链的响应速度,整合制造业专家、物流管理专家、数据科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的专业力量,打造智能供应链平台,推动智能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的深度融合。在这一过程中,跨领域个体协作促进了知识、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广泛交流,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来自管理实践的具体经验,为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中国管理现象提供了重要基础。第二,个体研究者之间通过思想交流,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共同认可的管理经验知识,即管理现象。这个过

程涉及研究者与实践者共享见解,综合来自实践的各种具体经验,对复杂的情境化知识进行提炼、抽象和概念化,从而转化为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种草视频”现象就是这种知识转化的典型案例。第三,人机协同获取隐性知识。由于大语言模型缺乏身体化经验以及自主决策的内在驱动,导致它们在处理复杂社交情境中的不确定性时,与人类认知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斯特朗等,2024),因此,尽管机器学习能够自动获取隐性知识,但是仍然需要人来进一步辨识和赋予意义,从而,人机协同成为了获取中国管理实践隐性知识、并提炼为中国管理现象的重要途径。

要实现从管理现象到管理理论的“惊险一跃”,在表出化阶段,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密切合作与知识整合是关键机制。理论是对概念及概念间联系的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涌现的诸如网红现象、新型举国体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新现象,需要突破单一学科局限、强化不同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从多角度、多层次来理解和解释,形成新的构念、理论和方法。例如,管理学者可以与信息技术专家合作,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情报机构如何更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立适应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林鑫等,2023);与经济地理学家合作,分析农村抖音网红发育水平的空间差异问题(张改素等,2024);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网红短视频对消费者旅游态度的影响(张可等,2022);与社会学家合作,探讨“网红”形成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吕鹏、李蒙迪,2022)。复旦大学信息管理与管理智能系是跨学术共同体协作的典型组织,聚集了神经管理学与神经人工智能学专家,前者揭示大脑潜意识与管理行为的神经机制,后者聚焦类脑芯片设计与脑启发算法的研发。该团队原创提出的“机理仿真—特征反演—观测实证”研究方法,成功应用于社会心理计算、突发事件管理等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不同学术共同体合作机制在推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组合作是把碎片化的理论整合为系统化管理学理论的关键过程,其主要机理是通过丰富和完善学术生态,推动系统化理论和“智能化科研”新范式的形成。在这一阶段,分散的知识逐步纳入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并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例如,随着近年来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展开了热烈讨论(朱秀梅、林晓玥,2022;戚聿东、肖旭,2020),使得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化转型理论日益完善。在此过程中,良好的学术生态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智能化科研”新范式“并没有取代原来的4种范式,只是在前4种范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凸显它的威力”(李国杰,2024)。一方面,学术会议、研讨会、学术期刊、数据库、跨学科学会、交叉学科平台和文科实验室等各种学术组织和活动,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交流平台,促进了知识整合和理论创新。例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通过成立“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横向发展平台”,加强了政府、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保护、劳动力市场替代、数据资产等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体现了学术生态完善对系统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有效科研管理体制和长期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能够激励研究者进行跨学科合作,推进原创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有效的科研管理体制应当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包括合理规划研究周期、包容创新失败和保障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机制应重视研究的长期影响,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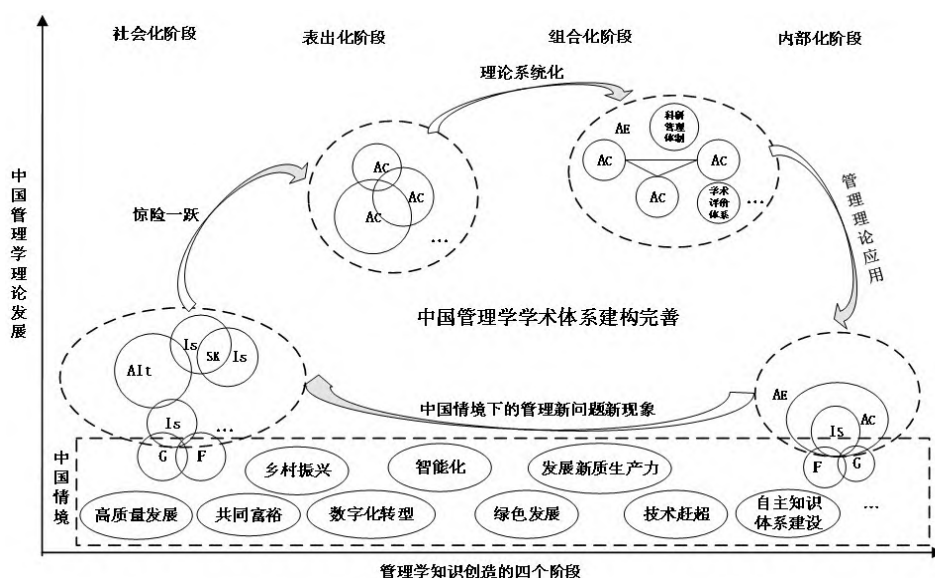


图3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机理

注: Is=学术个人, F=企业, G=政府, SK=共感知识; Alt=人工智能工具; Ac=学术共同体; AE=学术环境。

研究者在“组合化”阶段以原创性、系统性研究突破为目标,而不仅仅关注短期产出。

内部化阶段是将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与“干中学”密切相关。其主要机制是通过学术生态与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验证已有管理理论,将理论转化为管理应用,并发现新现象、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重新融入实践场域,将抽象的理论内化为AI情境下的实践理解;而管理者则将这些理论应用于组织实践,逐步转化为组织的隐性知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织,不仅使研究者能够检验现有理论的适用边界,还能在现有理论未能完全涵盖的方向上开辟新思路。例如,针对业界和学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败方面的分歧,金星晔等(2024)运用机器学习和大语言模型,构建了一套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发展了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帮助企业克服“不愿转、不敢转”的心态。又如,四叶草组织理论(何江等,2021)为理解当前企业采用灵活用工和智能机器劳动力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该理论在实践中需要应对更多新挑战,例如灵活用工或产消者劳动形态是否会导致深层次的劳动剥削(郑吉伟、张真真,2019),同时,核心专业员工数量的减少也对企业文化体系的稳定性构成了挑战。此外,学术生态与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有助于研究者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理念与技能。新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人机协同管理理念、动态适应与敏捷管理理念、伦理与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等。新技能包括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行动、自主性诉求和协调能力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者能够更加敏锐地识别出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方向,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奠定基础。

综上,在社会化阶段,人工智能增加了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知识共享的机会,提供了新的管理实践“场域”(见表1)。通过个体跨领域经验分享和人机协同,逐步完成了从管理实践知识到中国管理现象的提炼。在表出化阶段,AI工具激发了本土管理知识创新,提高了研究效率,通过不同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促进了中国管理学的术语革命和理论涌现。在组合化阶段,AI应用对管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科研范式和方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加速了系统化理论形成。在内部化阶段,AI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管理实践场景,验证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管理问题,推动了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持续发展。中国管理学知识创造是一个相互依赖、螺旋上升的循环递进过程。每个阶段都依赖于前一阶段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实践为这一过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机遇,推动管理学理论在“社会化—表出化—组合化—内部化”的循环中不断创新与优化,最终促成一个动态发展的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形成。

四、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策略

(一)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目标、主要特征和建构原则

1. 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目标

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目标是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建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学术体系。具体而言,第一,学术命题的独创性。学术命题是理论体系的核心,应当结合中国的经济转型、技术进步、社会文化等背景,反映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管理实践,提出原创性的学术命题。例如,如何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二,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不应仅停留于对西方管理思想的补充,“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⑧,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间寻求平衡(颜世

表1 AI赋能与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建构

SECI阶段	理论创造指向	AI赋能过程	学术体系建构机理
社会化	提炼中国管理现象。	AI应用增加产学研知识共享机会;AI应用提供管理实践新“场域”;人机协同获取隐性知识。	通过学术个体跨领域的经验分享,将管理实践知识提炼为管理经验知识和独特的中国管理现象。
表出化	形成中国管理概念、理论和方法。	本土大语言模型帮助激发了本土管理知识创新;大语言模型提升了学术研究效率。	通过不同领域学术共同体间密切合作与知识整合,形成管理学的概念和理论。
组合化	形成体系化的中国管理学理论。	人工智能体成为新研究对象;人工智能时代管理研究内容广泛变革;数据密集型计量方法出现;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促进了学科交叉。	通过丰富和完善学术生态,推动系统化理论的形成。
内部化	管理应用知识形成,发现管理实践的新问题和方向。	AI应用为中国管理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实践新现象成为理论创造新起点。	通过学术生态与管理实践融合,验证已有理论、将理论转化为应用、识别新问题。

富、马喜芳,2018)。例如,通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共生”等发展理念纳入管理学理论框架,发展以人类福祉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这种融合在人工智能时代尤为重要。第三,学术观点的创新性。中国管理学应勇于挑战现有观点,提出创新性的理论主张。例如,针对直播“网红”现象,国内学者已从消费者忠诚度(邹玉凤等,2023)、社会流动(吕鹏、李蒙迪,2022)、供应链决策(于天阳等,2022)等不同视角提出新的学术观点。第四,学术标准的规范性。在构建学术标准时,必须与国际通行规范充分融合。学术标准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普适性,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和应用。第五,学术评价的长期性。学术评价应注重长期导向和时代特征,不仅要紧扣人工智能时代的鲜明特点,还要反映学术成果的持久影响力,确保研究方向能够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第六,学术话语的自主性。通过提出独具特色的管理理论、模式和实践案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应在国际管理学术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充分表达中国管理学者的观点与立场。

2.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主要特征

在人工智能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学术体系应具备五大特征。第一,主体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⑤主体性特征体现了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独立性与自我发展能力。这要求融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传统智慧与国际先进理论,通过创新发展,形成具有独立性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方法。第二,原创性特征。需要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融合技术进步和文化传统,创新性地提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理论模型、管理方法和实践策略。在不断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协同发展。第三,先进性特征。中国管理学应持续推进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创新数字管理理论与方法,适应并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管理实践。第四,包容性特征。面对多元文化、跨学科知识和全球管理思想的碰撞,中国管理学应保持开放与兼容的态度。包容性特征要求我们吸纳全球管理理论的精华,同时深入挖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融合跨学科的知识,构建适应中国管理实践的多维理论视角与全面的理论框架。第五,国际性特征。应推动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国际交流合作,讲好中国管理故事,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性管理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3.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原则

基于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目标和主要特征,其建构应遵循5项原则。第一,本土化原则。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避免简单地照搬西方管理理论,扎根本土实践,形成真正能够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体系。这一原则要求管理学理论深植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提炼出反映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命题,准确回应管理实践中的挑战,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理论。第二,实践性原则。强调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建设不仅要注重学术观点的逻辑性,更要关注其对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管理学者在构建理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在现实中的适用性,使得理论不仅能够有效解释管理现象,还能切实用于指导和解决实际的管理问题。第三,科学性原则。要求管理学研究必须遵循严谨的学术标准,确保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人工智能时代,研究方法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理论建构应依托于严格的研究方法论,创造出系统化、可验证的管理知识。科学性原则确保管理学的知识体系是逻辑自洽、与时俱进、经得起检验的,从而为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第四,长期主义原则。强调管理学理论建构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为了短期效应而过度追逐热点或盲目迎合西方学术潮流。长期主义要求学者坚持基础理论的积累与深化,关注管理学的内在逻辑和长远发展趋势。理论建构应立足于对管理实践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趋势的前瞻性判断,致力于形成具有持久价值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第五,国际化原则。要求中国管理学在建构过程中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积极融入国际学术界,并在全球管理学界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原则确保中国管理学不仅服务于本土实践,也能够为全球管理实践提供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管理学在全球的学术话语权。

(二)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路径

1. 构建彰显中国元素的管理学理论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中国元素,这要求我们在理论构建中深入把握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探索中国管理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如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导新兴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等。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中国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交汇背景下,还要理解如何实现数字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要“放得活”,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又要“管得住”,通过完善数据要素的定价机制、交易方式和监管体系确保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迟福林,2024),为中国管理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实践的复杂性与中国特有情境相结合,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例如,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电商平台发展的情境下,涌现出“淘宝村”“新农人”“资本下乡”等具有中国特色、富含中国元素的管理现象(彭小珈,2023;伍麟、朱搏雨,2024;周浪,2020)。面对这些新现象,在构建管理学理论体系时,我们应贯彻《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文件精神,坚持立足中国实际,避免“拿来主义”和“闭门造车”式的理论套用,增强对中国元素的感知和洞察。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体现,还蕴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管理学理论在回应技术进步的同时,重视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确保“负责任人工智能”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由此,管理学者应深入研究本土企业在智能化转型中的独特实践,挖掘中国元素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富有思想深度的管理现象,推动AI技术应用与本土文化情境融合的术语革命和理论构建。

2. 推动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实践面临着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和全球性的普适性问题。理论源于实践,中国管理学理论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土管理实践的独特性,同时积极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共性经验,走出一条创新与融合的发展道路。首先,应积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应鼓励学者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市场等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和问题,推动原创性理论发展,增强中国管理学的主体性与学术影响力。可以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支持针对中国管理现象的理论创新,解决现有管理理论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的不足(黄群慧、邵婧婷,2025)。其次,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普适性问题,政府应推动企业、高校与国际学术界的协同创新,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理论,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本土化改造,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例如,面对AI技术层面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和非技术层面引致新兴的非系统性风险,邓悦等(2024)在借鉴了各国治理模式与治理工具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中国AI风险治理能力的思路。又如,有研究借鉴了德国工业4.0白皮书、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工信部的智能制造定义,探讨中国智能制造问题,并在中国情境下拓展这些普适理论,构建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刘建丽、李娇,2024)。最后,新型研究范式和中国情境的协同是中国管理学先进性与国际性的重要保障。在知识转化的组合化过程中,“智能化科研”范式的兴起不可能取代中国情境,以强化学习为例,以强化学习为基础的监督模型可以识别数学对象之间的模式和关系,并帮助引导直觉,提出理论猜想,有助于揭示未知的理论模式,但是,强化学习方法可能无法很好地推广到模型训练期间未见过的数据,因为一旦人工智能体找到了一系列有效操作,它可能会陷入局部最优解(王等,2023a),这就意味着适应西方数据的理论模型不一定适应中国情境,中国学者应在中国情境与“智能化科研”范式间寻找契合点,既要拥抱Deepseek、ChatGPT等AI大语言模型带来的研究机遇,更要深入挖掘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提炼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充分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定义和整合管理现象与理论关系,形成既能融入国际主流,又具备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

3. 政产学研合作驱动中国管理学学术共同体建设

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使得管理实践面临多重情境因素的叠加,特别是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并行发

展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面对技术创新、市场转型、绿色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挑战,为原创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现实需求。要从这些复杂情境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现象”和“中国元素”,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必须依赖政产学研合作驱动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从管理知识创造的机理来看,将实践经验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管理现象,需要政界、产业界和学术界个体之间的思想激荡。而管理现象“惊险一跃”,发展为管理理论的表出过程,更需要不同领域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理论整合。然而,长期以来,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仍然不够深入(姚奇富等,2022),导致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突出。为应对这一挑战,应加快落实《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7)《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2019)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指南》(2023)等文件精神,建议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驱动中国管理学学术共同体建设。首先,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财政、土地等组合式激励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⑥,推动企业积极融入管理学科的研究与人才培养,确保企业需求直接嵌入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中,推动知识生产良性循环。其次,要通过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和产业学院,推动管理理论的应用,促进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转化。最后,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鼓励高校与企业在智能化技术应用领域联合开展前沿课题研究,捕获更多具有中国元素的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增强中国管理学科的原创新性和时代性。

4. 优化管理学学术生态环境

首先,改革科研管理制度,完善长期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精神,“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简化科研项目的申请和管理流程,减少学者的行政事务负担,鼓励他们更多精力投入到知识创造和转化中。同时,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精神,鼓励学者通过与企业、政府等社会主体的紧密合作,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打破组织壁垒,强化与AI相关的创业公司的联系,融入这些企业科研团队拥有的前沿性科研能力、工程开放能力和商业化能力,获取第一手实践资料,以确保理论研究紧贴智能化时代管理实践需求。着力改变学术研究偏向“短、平、快”的现状,通过完善学术评价机制,突出质量导向和长期导向,鼓励学者投入具有原创性和应用价值的管理问题研究。在此过程中,学术期刊应发挥关键平台作用,增加对本土管理现象的专题特刊或专栏,重点遴选原创性强、聚焦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成果,推动本土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其次,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动态完善管理学科专业分类。AI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使得管理学科专业设置必须具备高度适应性。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2023)提出的动态调整原则,建议高校应破除内部壁垒,超常布局“智能管理”等新兴交叉学科,推动管理学与AI、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结合,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同时,教育部门应健全学科专业的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管理学科设置进行审查和更新,确保其与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保持同步。最后,学术生态建设需要融入全球化视野。应鼓励中国管理学者参与引领全球AI治理体系建设,围绕AI技术风险与安全问题、智能经济和AI驱动的管理研究领域,通过主办国际会议、组织跨国研究项目、发表国际期刊论文等方式,分享中国在智能化管理中的独特经验。同时,鼓励学者与国际顶尖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促进双向知识流动,提升中国管理学在全球学术领域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术体系建构为研究目标,本文从形成难度、社会转型、学科分类、发展现状和学术生态等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国管理学术体系建构的五大制约因素。接着,基于知识创造的视角,解构了AI技术赋能管理学知识创造的过程,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实践为管理学理论创造注入了新动力,推动了管理知识在“社会化—表出化—组化—内部化”螺旋式上升的创造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相应地,中国管理学术体系的建构也经历了一个相互依赖、循环递进的建构过程,包括跨领域个体经验分享和人机协同、跨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整合、学术生态的丰富以及学术生态与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构策略。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管理学研究带来了广阔的机遇。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视

角,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方法变革,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管理实践都为中国管理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机会(如图4所示)。

第一,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组织价值创造的新内涵。首先,研究机会来自于对新型管理生态的剖析。例如,蔡双立和马洪梅(2023)探讨独占机制和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确定了企业的相对最优开放区间和最佳保护边界。重点研究方向在于探索如何将新型管理生态转化为组织竞争优势,如何利用AI手段优化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在新的决策环境中完善企业约束激励机制,提升组织协作效率,以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其次,人工智能体进入管理实践领域,标志着交流的能动性从人类专属扩展至人机共享(宋美杰、刘云,2023)。设计者通过定义并控制人工智能体与其他主体或智能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和激励机制,力图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接近理性的算法,从而形成所谓的“机器经济人”。这一转变推动了行为主体理性人假设向“算法理性”方向的演进,对“算法理性”内涵和特征的研究因此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算法理性”对传统管理学理论构成了广泛挑战,例如,人工智能体的引入改变了经典囚徒困境模型中的纳什均衡选择(帕克斯、韦尔曼,2015)。未来研究机会来自如何持续完善中国情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例如,何大安(2024)构建了一个以AI技术运用为主线的分析框架,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企业竞争路径,进而重塑产业组织架构。最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机会、技术独占性条件与累积性条件等技术体制的变革,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这些变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商业模式创新、技术追赶和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例如,张华和顾新(2023)的研究表明,高水平独占性显著增强了数字化能力通过开放式创新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

第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组织价值创造的新机制。首先,关于AI技术应用的价值驱动机制,已有研究从经济、技术、社会等维度展开了讨论(李卫兵、张星,2023;赫钦森,2022;克莱因等,2020)。在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未来的研究机会在于深入探讨AI如何助力中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社会公平,以及研究经济、技术、社会等多因素融合的驱动机制。其次,组织价值创造机制探讨。外部视角的研究焦点在于,组织如何感知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市场和技术机会窗口,通过获取、整合和利用内外部资源,实现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瑟蒙等,2011),例如,研究发现,平台通过数据驱动学习来对用户行为实施精确分析和定制化操作,从而增强价值捕获的能力,然而,这些手段可能会导致用户感知价值下降,因此,平台需要在价值捕获和用户价值感知之间找到平衡(克拉夫、吴,2022)。研究机会包括:政府如何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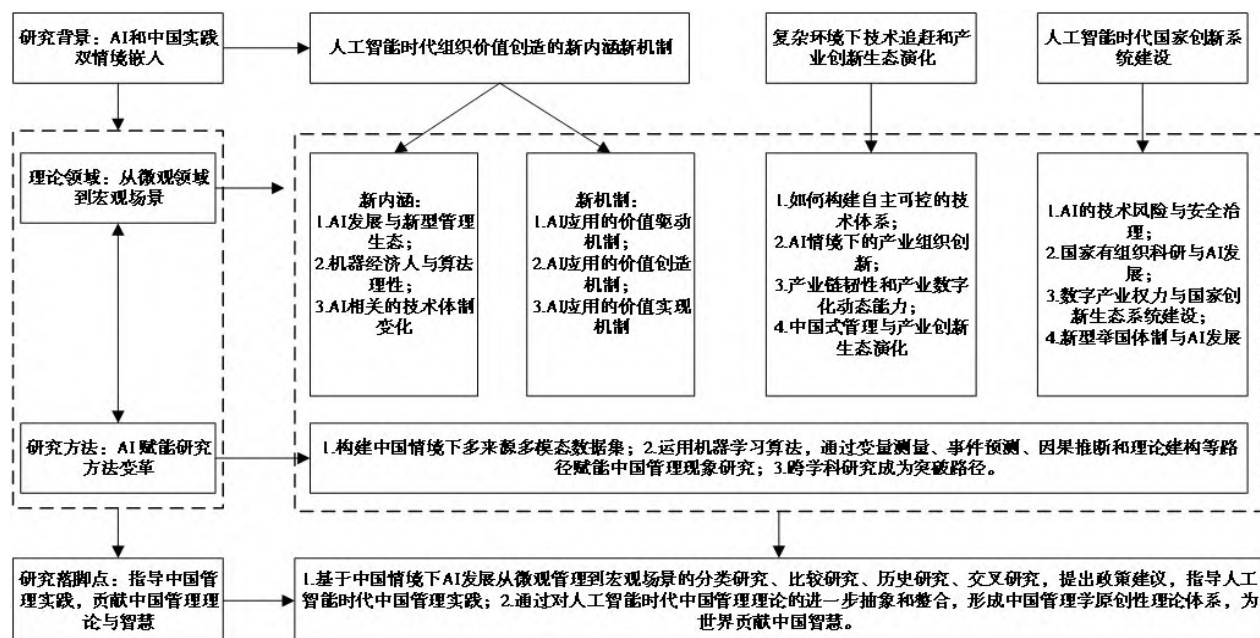


图4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管理学理论的研究机会

制度,为推动新型工业化,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制度机会窗口;中国企业如何动态协调内外部资源,如何在快速变化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如何嵌入多元参与者的价值网络等。从内部视角来看,可以探讨中国企业在组织过程、组织能力和价值主张之间的互动与演化,特别是在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探索如何通过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实现竞争优势。最后,价值实现机制分析 also 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机会在于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智能自动化和智能增强方式实现商业价值(王等,2023b;盛虎等,2023)。例如,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系统精准捕捉用户画像和偏好,优化内容分发,从而增强用户黏性并吸引更多用户(匡文波、王天娇,2023)。此外,研究机会还包括在AI应用过程中面临的创造与风险防范的平衡等,例如,戚聿东和刘健(2024)研究指出AI产业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会产生多层次、多元化、复合型的风险。

第三,关注复杂环境下技术追赶和产业创新生态演化。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的持续强化,导致我国在光刻机、电池材料等关键领域面临“小院高墙”式的技术封锁,使得我国在AI关键技术追赶和产业创新方面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复杂环境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机遇。机会来自于研究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替代,“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⑤,探索如何建构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AI相关技术体制与市场体制联结视角看,研究机会还包括:AI技术机会与我国市场特征的匹配如何影响产业创新追赶,复杂环境下AI技术独占性条件和市场体制匹配在我国高技术产业追赶过程的作用等。从AI对产业生态的复杂影响看,研究机会还包括AI情境下的产业组织创新,最新研究指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组织边界将变得更加灵活,会催生新的工作角色和组织形式,并可能模糊竞争者、供应商、客户、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之间的界限(马利亚尼、德维韦迪,2024)。面对技术封锁,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及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动态能力(尹西明、陈劲,2022)等。此外,中国式管理强调以人为本、注重集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理念,研究机会在于探索中国式管理与产业创新生态演化的关系,例如,探讨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和合共生”等理念融入中国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第四,讨论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问题。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不仅决定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还直接关系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有效利用AI技术,提升国家创新系统的安全、效率和效能,已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首先,研究机会来自AI技术风险和安全治理。AI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应用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包括算法歧视、决策偏差风险、系统安全性风险、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界定风险、市场应用风险等。AI应用还带来了伦理问题、社会责任和制度保障等重要议题。未来研究的主要机会和任务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其次,研究如何通过国家有组织科研体系优化AI研发的资源配置。国家有组织科研体系在推动AI关键技术突破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再次,数字产业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决定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产业权力是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权力层级关系(李君然、魏莹,2024),影响着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机会包括探讨国家如何通过提升创新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来增强数字产业权力。例如,研究国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最后,新型举国体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推动重大科技项目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基础、特征、作用机制和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在AI发展中的作用,还可为其他科技创新模式提供借鉴。

第五,深化AI赋能的管理研究方法变革。首先,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⑥,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多来源、多模态数据基础设施,应涵盖结构化数据、社交媒体信息、传感器数据、文本数据和图像数据等多种形式。在此过程中,研究机会在于探索如何有效整合这些多模态数据,以推动管理研究方法变革。其次,机器学习在变量测量、事件预测、因果推断和理论建构4个

方面对管理学实证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景江等,2023)。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机会,例如,研究指出,通过算法支持的归纳推理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数据中构建理论(施雷斯塔等,2021)。又如,主题建模正迅速成为从大型文本数据集中创建和构造度量的有用方法,将小规模案例研究与大型定量数据集的机器学习相结合,已成为发展和阐述理论的新方法(提德哈尔、艾森哈特,2020)。再次,跨学科研究是“智能化科研”范式的重要路径,然而,AI时代跨学科研究推动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动机不明确、语义不通、研究效率低下和理论深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雷内克等,2024),构成了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方向。最后,管理研究方法的变革为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多模态数据应用和机器学习算法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方法,使中国学者有机会从变量测量、因果推断等角度深入挖掘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独特现象和规律。例如,华秀萍等(2023)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文本数据,使用词向量等机器学习模型,提炼了中国企业文化的维度,并测度了企业文化的强度水平。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时代为中国管理学研究带来了广泛的机遇。中国学者应立足本土情境,主动适应智能化科研范式,深入把握中国现象,融入中国元素,聚焦中国问题,开展富有创造性的研究。通过扎根中国实践,采用前沿的AI方法和工具,结合分类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发展具有高度原创性和强大解释力的管理学理论,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学术体系,为指导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并为全球管理学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朱正浩,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商务贸易学院;赵志栋,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

注释

①③⑧⑨⑭⑯⑰⑱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slb=true.html。

②⑥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④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筑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⑤⑮人民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⑦“小院高墙”指围绕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划定的策略边界。

⑩“佛系青年”指态度平和、随遇而安、不过度追求物质成功的年轻人群体。最新研究进展参见:雷开春(2024)。

⑪相关研究参见:李(2012)、席西民和刘鹏(2022)、曾仕强(2005)、贾利军等(2020)。

⑫“种草短视频”是一种网络社交媒体营销形式,通过短视频内容展示产品或服务,激发观众的兴趣和购买欲望,达到推荐和促销的效果。最新研究可参见:杨强等(2023)。

⑬人工智能体通常指具备一定智能行为和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特定环境中通过算法和数据处理来自主感知、决策和执行任务。

⑭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巴拉迪亚(Bharadiya);林(Lim);贝西奥卢(Besiroglu);海因莱因(Haenlein);拉格纳(Lagna);拉维尚卡尔(Ravishankar);崔(Tsui);刘(Liu);费尔德曼(Feldman);奥列科夫斯基(Orlikowski);奥尔蒂斯-德-曼多哈纳(Ortiz-de-Mandojana);班萨尔(Bansal);菲拉托切夫(Filatovtchev);野中郁次郎(Nonaka);竹内弘高(Takeuchi);王(Wang);费斯(Faith);西姆(Seam);帕克斯(Parkes);韦尔曼(Wellman);肯普(Kemp);查萨尔(Csaszar);施泰因贝格(Steinberger);施雷斯塔(Shrestha);格莱姆斯(Grimes);唐曼(Man Tang);阿西(Athey);因本斯(Imbens);乔杜里(Choudhury);冯·克罗赫(von Krogh);贝利科夫(Belikov);斯特朗(Strachan);赫钦森(Hutchinson);克莱因(Klein);瑟蒙(Sirmon);克拉夫(Clough);吴(Wu);马利亚尼(Mariani);德维韦迪(Dwivedi);提德哈尔(Tidhar);艾森哈特(Eisenhardt);雷内克(Reinecke);李(Li)。

参考文献

- (1)白长虹:《推进管理知识旋转门》,《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2期。
- (2)白长虹:《面向实践的管理学研究转型》,《南开管理评论》,2020年第2期。
- (3)毕达天、王璐、王雨菲、车尧:《AIGC产品用户需求特征体系构建及改进策略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24年第14期。
- (4)蔡双立、马洪梅:《开放式创新、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鱼和熊掌如何兼得?》,《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5期。
- (5)陈德球、孙颖、王丹:《关系网络嵌入、联合创业投资与企业创新效率》,《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
- (6)迟福林:《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及重点》,《人民论坛》,2024年第15期。
- (7)邓悦、许弘楷、王诗菲:《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模式、工具与策略》,《改革》,2024年第1期。
- (8)封凯栋、陈俊廷:《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共识与机制探索》,《学术研究》,2023年第12期。
- (9)何大安:《生成式AI、企业竞争路径与产业组织架构》,《求索》,2024年第5期。
- (10)何江、闫淑敏、关娇:《四叶草组织:一种新型混合劳动力组织形态》,《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2期。
- (11)洪永森、汪寿阳:《数学、模型与经济思想》,《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 (12) 华秀萍、程思睿、李婉宁、王勇:《非正式融资中的文化力量——企业文化对商业信用的影响》,《金融研究》,2023年第10期。
- (13) 黄群慧、邵婧婷:《加快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14) 贾利军、张萌、李琦、赵庆杰:《五行正义及其营销意蕴》,《管理学报》,2020年第1期。
- (15) 金星晔、左从江、方明月、李涛、聂辉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难题: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新方法与新发现》,《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 (16) 匡文波、王天娇:《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传播逻辑与平台社会责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17) 雷开春:《青年“佛系”亚文化的成因、特点和潜在风险——以“青年养老院”现象为例》,《人民论坛》,2024年第12期。
- (18) 李国杰:《智能化科研(AI4R):第五科研范式》,《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1期。
- (19) 李君然、魏莹:《国家目标下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极紫外光刻机为例》,《学术研究》,2024年第1期。
- (20) 李卫兵、张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交易成本》,《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21) 李志军、尚增健:《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字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 (22) 林鑫、罗宇、邹玲:《面向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情报工作发展思考》,《情报科学》,2023年第7期。
- (23) 刘爱生:《美国大学中的学术惯例及其功能》,《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11期。
- (24) 刘建丽、李娇:《智能制造:概念演化、体系解构与高质量发展》,《改革》,2024年第2期。
- (25) 刘景江、郑畅然、洪永森:《机器学习如何赋能管理学研究?——国内外前沿综述和未来展望》,《管理世界》,2023年第9期。
- (26) 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27) 刘涛雄、戎珂、张亚迪:《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 (28)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 (29) 吕鹏、李蒙迪:《从“草根”到“网红”:势差理论视角下社会流动现象审视》,《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30) 吕越、谷玮、尉亚宁、包群:《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
- (31) 彭小珈:《农村电商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淘宝村”电商集群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 (32) 戚聿东、刘健:《人工智能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 (33) 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 (34) 盛虎、张开阳、李静怡:《内容、用户和收入:网络视频平台差异化管理模式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1期。
- (35) 盛昭瀚、于景元:《复杂系统管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新领域》,《管理世界》,2021年第6期。
- (36) 盛昭瀚:《扎根中国实践是我国管理学研究的优良品格》,《管理工程学报》,2024年第2期。
- (37) 宋美杰、刘云:《智能新物种崛起与人机传播模式重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38) 汪立鑫、游怡乐:《我国地方政商关系相对西方模式的特色优势》,《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
- (39) 王秉:《何为数智:数智概念的多重含义研究》,《情报杂志》,2023年第7期。
- (40) 王方华:《守正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上海管理科学》,2022年第6期。
- (41) 王俊秀:《ChatGPT与人工智能时代:突破、风险与治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 (42) 王林辉、钱圆圆、周慧琳、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和中国职业变迁方向》,《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
- (43) 王嵩迪:《封闭与开放之间:跨学科育人背景下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审思》,《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3期。
- (44) 王一军:《大学学术文化:抵及学生心灵深处的隐性课程》,《江苏高教》,2022年第12期。
- (45) 魏江、陈光沛:《管理研究中的“中国元素”:从情境到理论——兼评李家涛〈从中国元素到全球管理理论——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展望〉》,《管理学季刊》,2022年第1期。
- (46) 魏江、杨佳铭、陈光沛:《西方遇到东方:中国管理实践的认知偏狭性与反思》,《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 (47) 吴小龙、肖静华、吴记:《当创意遇到智能:人与AI协同的产品创新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3年第5期。
- (48) 伍麟、朱搏雨:《希望的“云”田野:新农人数字劳动的过程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 (49) 席西民、刘鹏:《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应用》,《前线》,2022年第9期。
- (50) 颜世富、马喜芳:《中国管理学如何为世界管理学做出新贡献——“第21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学术思想述要》,《管理世界》,2018年第5期。
- (51) 杨强、霍佳乐、江燕伶、丰超、肖久灵:《如何讲述产品缺点——“种草”短视频的信息双边性对消费者关注行为和购买行为的不对称影响》,《南开管理评论》,2023年第6期。
- (52) 姚奇富、朱正浩、张良:《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演化与特征——三螺旋理论案例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年第1期。
- (53) 尹西明、陈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源起、内涵与理论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
- (54) 于天阳、关志民、董经洋、曲优:《不同权力结构下考虑网红营销努力的直播电商供应链决策研究》,《管理学报》,2022年第5期。
- (55)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企业文化》,2005年第8期。
- (56) 张改素、于佳甜、马芳芳、丁志伟、李晗:《中国农村抖音网红发育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24年第6期。
- (57) 张华、顾新:《数字化能力、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创新独占性的调节效应》,《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3年第6期。
- (58) 张可、许可、吴佳霖、徐亚楠、李可心:《网红短视频传播对消费者旅游态度的影响——以丁真走红现象为例》,《旅游学刊》,2022年第2期。
- (59) 张正堂:《如何提升中国管理学研究对实践的贡献——基于管理知识生产传播模型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10期。

- (60) 郑吉伟、张真真:《评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动的研究》,《经济学家》,2019年第12期。
- (61) 周浪:《另一种“资本下乡”——电商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与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2期。
- (62) 朱秀梅、林晓阳:《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脉络梳理与整合框架构建》,《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年第4期。
- (63) 邹玉凤、卢向华、李凤瑶:《网红直播电商能带来忠诚消费者吗?——来自某化妆品品牌消费者购买的证据》,《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5期。
- (64) Athey, S. and Imbens, G. W., 2019,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hat Economists Should Know Abou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11(1), pp.685~725.
- (65) Belikov, A. V., Rzhetsky, A. and Evans, J., 2022, “Prediction of Robust Scientific Facts from Literature”,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vol.4(5), pp.445~454.
- (66) Besiroglu, T., Emery-Xu, N. and Thompson, N., 2024, “Economic Impacts of AI-augmented R&D”, *Research Policy*, vol.53(7), No.105037.
- (67) Bharadiya, J. P., 2023, “Machine Learning and AI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ol.48(1), pp.123~134.
- (68) Choudhury, P., Wang, D., Carlson, N. A. and Khanna, T., 2019,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to Facial and Text Analysis: Discovering CEO Oral Communication Styl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40(11), pp.1705~1732.
- (69) Clough, D. R. and Wu, A., 20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driven Learning, and the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of Platform Ecosyste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47(1), pp.184~189.
- (70) Csaszar, F. A. and Steinberger, T., 2022, “Organizations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alogies in Organization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16(1), pp.1~37.
- (71) Faith, C. K. and Seeam, A. K., 2018, “Knowledge Sharing in Academia: A Case Study Using A SECI Model Approach”,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9(1), pp.53~70.
- (72) Feldman, M. S. and Orlikowski, W. J., 2011, “Theorizing Practice and Practicing The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2(5), pp.1240~1253.
- (73) Filatotchev, I., Ireland, R. D. and Stahl, G. K., 2022, “Contextualizing Management Research: An Open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59(4), pp.1036~1056.
- (74) Grimes, M., Von Krogh, G., Feuerriegel, S., Rink, F. and Gruber, M., 2023, “From Scarcity to Abundance: Scholars and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66(6), pp.1617~1624.
- (75) Haenlein, M., Huang, M. H. and Kaplan, A., 2022, “Guest Editorial: Business Ethic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178(4), pp.867~869.
- (76) Hutchinson, P., 2020, “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e Impact of Self-innov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68(2), pp.628~639.
- (77) Kemp, A., 2024,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ward a Theory of Situated AI”,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49(3), pp.618~635.
- (78) Klein, A., Sørensen, C., de Freitas, A. S., Pedron, C. D. and Elaluf-Calderwood, S., 2020, “Understanding Controversies in Digital Platform Innovation Processes: The Google Glass Cas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152, No.119883.
- (79) Lagna, A. and Ravishankar, M. N., 2022,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with Fintech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vol.32(1), pp.61~102.
- (80) Li, P. P., 2012,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Indigenous Research: The Geocentric Implications of Yin-Yang Bala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9, pp.849~872.
- (81) Lim, W. M., Gunasekara, A. and Pallant, J. L., et al., 2023, “Generative AI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Ragnarök or Reformation? A Paradoxical Perspective from Management Educato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vol.21(2), No.100790.
- (82) Liu, P. C., Wang, W., Wang, Z. and Yang, Y., 2024, “W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mine the Effects of Guanxi on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vol.116, pp.12~25.
- (83) Man Tang, P., Koopman, J., McClean, S. T., Zhang, J. H., Li, C. H., De Cremer, D., et al., 2022, “When Conscientious Employees Meet Intelligent Machine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Inspired by Complementarity Theory and Role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65(3), pp.1019~1054.
- (84) Mariani, M. and Dwivedi, Y. K., 2024,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 Preview of Fu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175, No.114542.
- (85) Nonaka, I. and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6) Ortiz-de-Mandojana, N. and Bansal, P., 2016,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7(8), pp.1615~1631.
- (87) Parkes, D. C. and Wellman, M. P., 2015, “Economic Reaso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ce*, vol.349(6245), pp.267~272.
- (88) Reinecke, J., Little, L. M., Simons, T., Bliese, P., Dencker, J., Roberson, Q., et al., 2024, “Advancing Management Theor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67(6), pp.1421~1427.
- (89) Shrestha, Y. R., He, V. F., Puranam, P. and von Krogh, G., 2021, “Algorithm Supported Induction for Building Theory: How Can We Use Prediction Models to Theorize?”,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32(3), pp.856~880.
- (90)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and Gilbert, B. A., 2011,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7(5), pp.1390~1412.

- (91) Strachan, J. W., Albergo, D., Borghini, G., Pansardi, O., Scaliti, E., Gupta, S., et al., 2024, "Testing Theory of Mind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Human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8(7), pp.1285~1295.
- (92) Tidhar, R. and Eisenhardt, K. M., 2020, "Get Rich or Die Trying... Finding Revenue Model Fit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Multiple Cas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41(7), pp.1245~1273.
- (93) Tsui, A. S., 2006,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2(1), pp.1~13.
- (94) von Krogh, G., Roberson, Q. and Gruber, M., 2023, "Recognizing and Utilizing Novel Research Opportunitie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66(2), pp.367~373.
- (95) Wang, H., Fu, T., Du, Y., Gao, W., Huang, K., Liu, Z., et al., 2023a,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ure*, vol.620, pp.47~60.
- (96) Wang, L., Huang, N., Hong, Y., Liu, L., Guo, X. and Chen, G., 2023b, "Voice-based AI in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32(4), pp.1002~1018.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i Yudong^a, Zhu Zhenghao^b and Zhao Zhidong^c

(a.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rade, Nanj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c.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AI have imposed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influence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remain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clear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stat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mands of the AI era. This phenomenon raises a core theoretical question: how to construct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AI era?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major constraints in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t then exam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reation, the process by which AI technologies empower the generation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driven by AI.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and 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rough the spiral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Chinese management theories can evolve and be refined. Correspondingly,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undergoes an interdependent, cyclically progressiv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at includes cross-disciplinary sharing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exchange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mong academic communities, enric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academic ecosystem,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cademic ecosystem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offers directional insights into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AI era.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knowledge creation;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academic system

=====

(上接第107页)

- (78) Treynor, J. and Mazuy, K., 1966, "Can Mutual Funds Outguess the Mark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44(1), pp.131~136.
- (79) Verbeek, M. and Wang, Y., 2013,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Copycat Fund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37(9), pp.3454~3471.

The Cognition Cap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Mutual Funds: Evidence from the Activeness of Managerial Report Texts

Zhang Wei^{a,b}, Chen Zhuo^b and Lin Shen^{a,b}

(a.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 and Analytics of Complex Management Systems (CACMS), Tianjin University; b.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ational policies aimed at cultivating world-class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the evaluation of fu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has become a central concern shared by academia, industry,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owever,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structured data, suffers from low signal-to-noise ratios, susceptibility to manipulation, and the potential for strategic concealmen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shifts the traditional evaluation logic from "behavior-performance" to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on", and proposes a novel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unstructured data, thereby advancing the existing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fund capabilities. Drawing on a dataset of 46,050 fund management reports from 2008 to 2021, this study leverages the Doc2Vec machine learning model to measure market cognition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activeness in fund manager commentaries. Moreover, it highlights differences in funds' timing abilitie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e existing fund evaluation systems that primarily focus on capturing stock-picking skills. The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underlying predictive mechanisms of this indicator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heterogeneity of market changes, the pathway from cognition to action, and the external impact of investors' limited attention. These analyses provide clear empirical support for a "cognition-behavior-performance" causal chain. By enriching the current fund capa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this study offers valuable guidance for directing capital toward high-capability fund managers, thereby enhancing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at the macro level and improving the long-term welfare of retail investors and social security capital at the micro level.

Keywords: cognition capability; fund performance; manager reports; text similarity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i Yudong^a, Zhu Zhenghao^b and Zhao Zhidong^c

(a.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rade, Nanj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c.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Summary: The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AI have posed new dema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the AI era and develop an academic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a stable structure and internally coherent logic, thereby better adapting to and guid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n imperative need to deeply integrate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e their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ies. However,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the needs of the AI era. This phenomenon raises a key theoretical question: How to construct an academic system for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AI era? To address this issue systematically, this study adopt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onstraints construction –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construction – pathways construction – research prospects". We first analyze the constraint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in the AI era, then introduce the SECI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 to examine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by which AI empowers the creation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Based on this analysis, we propose the goals,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and outline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straints in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arise from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e AI era and overall societal change, the lag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te support from the academic ecosystem. (2) The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AI era injects new impetus into the creation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driving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through a spiral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 externalization – combination – internalization",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dynamically evolving academic system. (3)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academic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terdependent and cyclically advancing process that includes cross-disciplinary sharing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exchange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mong academic communities, enric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academic ecosystem,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academic ecosystem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4) The construction pathway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management theory system that reflects distinct Chinese elemen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system,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community through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academic ecosystem. (5) The advent of the AI era presents rich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This study has two key contributions. First,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how to construct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era of AI. Second, based on knowledge creation theory, it analyzes how AI empowers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offering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I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theori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knowledge creation;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academic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A20, M10, O30